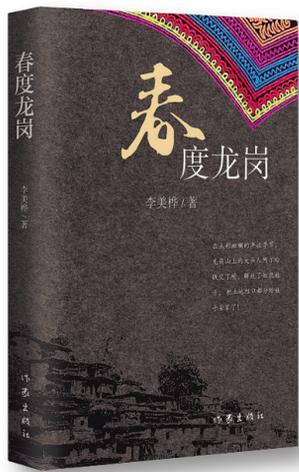


绘制民族革命的

历史画卷

——读李美桦长篇小说《春度龙岗》

□唐小林



《春度龙岗》，李美桦著，作家出版社，2023年12月

下，在日益变动的具体情景中，去揣摩和描绘各色人等的内心波澜，去处理阿尔哈铁人中心人性的细微变化，揭示他必然走向和平道路的心理逻辑。在工作队的广泛发动、深入动员和重点突破下，再加上击溃了凶恶残匪的袭击，不仅葬区民众心向民主改革，而且飞云铺的黑舞头人阿尔拉则、兹兹乌日的黑舞奴隶主勒伍尔甲也先后交出枪支，当上新政府的副区长，虽然后者最终叛变身亡，却无疑撼动了阿尔哈铁拒不下山的心理基础。阿尔拉则和勒伍尔甲都与阿尔哈铁沾亲带故，他们弃他而去的行为，本身就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结果。后来杨黑子仇以恩报，飞身挡住射向阿尔哈铁子弹，也在一定程度上击溃了阿尔哈铁的心理防线。这颗子弹没有打中阿尔哈铁的身体，却击中了一个男人隐藏最深的柔软情感。工作队的陈达五不携带任何武器，和乌嘎意骑马上山，以朋友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的身份，与阿尔哈铁掏心窝子长谈，解开了阿尔哈铁“担心总有一天，有人会跟我这个黑舞头人算总账”的心结，使他最终走出“心狱”，实现人心人性的根本性转变，拥抱和平，积极投身新社会的革命和建设。

以“在场”的外在行动叙事“不在场”的内在心理，在“外”与“内”、行为与心理的映照、呼应与书写中，《春度龙岗》既获得了现实的根据，又获得了心理的支持，塑造出阿尔哈铁、阿尔拉则、乌嘎意、陈达五、沙阿果、俄狄狄子等一批血肉丰满、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焕发出充沛的现实力量。换言之，正是在触及民族地区民主改革进程中人心人性的真实图景的广度和深度上，《春度龙岗》展现出一幅广阔的民族地区民主革命的历史画卷，拓展了红色历史的文学表现空间，呈现了新的艺术经验，成功实现了历史题材的当代转换。

值得一提的是《春度龙岗》的叙事艺术。小说回避矛盾，迎难而上，正面强攻，之所以能有如此出色的艺术效果，首先得力于巧妙合理的结构布局。小说的结构有一个硬核：拿下黑舞头人阿尔哈铁占据的龙岗山。小说以“上山下山”为脉络，“山”成为叙事核心，其他血肉都是从这个“硬核”中生长出来的。小说叙事有了一个大“纲”，其他的“目”都围绕这个“纲”展开。这个“纲”正是民族地区民主改革的难点、要害和关键，抓住了这个“纲”，也就能够起到纲举目张的作用。再加上阿尔拉则和乌嘎意这两个“串线”人物在主要对立双方的“走动”，在历史与现实间穿梭，使得小说的叙述在围绕龙岗山这个硬核展开时，显得骨架突出、经纬交织，肌理结实，情节生动，既重点突出、线索清晰，又举重若轻、枝蔓缠结。细节丰富，表现出作者的艺术匠心。其次是小说厚植文化土壤，大量运用民族民间广泛流传的古话、格言、谚语、典故、山歌等，原汁原味表现出民族的事理德行、生存经验、生活智慧、生命形态、文化习俗，给小说人物以文化根脉，不仅让读者能够迅速代入民族的文化场域，而且很好地塑造了民族的民族文化心理和文化性格，对于打造民族文化记忆意义非凡。再次，小说的语言干净漂亮，画面感、可视性强，景物描写极富诗意，库史新年等风俗铺陈颇具特色，瞎眼的木洛老汉摸地等细节都给人以深刻印象。

(作者系四川大学教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春度龙岗》最先发表在《民族文学》2023年第7期，由作家出版社年底推出单行本。总体上讲，《春度龙岗》在重大题材的写作上有所突破，它真实再现了民族地区推进民主改革的历史过程，绘制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民族革命的历史画卷，呼应了民族融合与和平发展的时代大潮，是近年来一部难得的关于民族变革的长篇历史小说。

这部讲述新中国成立之初民族地区民主改革的作品，妙就妙在“春度”上。“龙岗”是黑舞大头人、外号飞天蜈蚣的阿尔哈铁盘踞的地方，是民族奴隶制社会的顽固堡垒，也是国共两党和多方势力争夺的政治场域，更是“凉山一步跨千年”的最后障碍。摆在作家李美桦面前的叙述难题是：他不仅要重返历史现场，让小虚构尽可能揭开历史真相，又要回应民族融合的时代主题以及和平发展的世界大潮。照理，在那时“拿下”龙岗毫无问题，共产党已经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决定性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正在绝大多数地区蓬勃开展。但“如何拿下”龙岗，早已不是一个武装力量的对比问题。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是包括彝族在内的五十六个民族认同的政治和文化共同体。在这个意义上，“春度”既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也是这部小说必须遵循的“叙述政治”。

这就决定了《春度龙岗》在小说叙述上的难度。“春度”一词，在小说文本中意义丰赡，既可以理解为春风拂柳，改天换地，万象更新；更可理解为和平解决龙岗，实现民主改革，葬区一度千年，从奴隶制的严冬迈入新社会的春天。但和平解决龙岗谈何容易？这中间横亘着太多难以逾越的难题。首先红军游击队的幸存者杨黑子就不同意，阿尔哈铁手上沾满红军的鲜血，欠下了一百多条红军战士的命债，一想到龙岗，杨黑子就想到复仇。而以省党部冯正和主任为代表的国民党残余势力，早把龙岗作为反攻大陆的重要据点，暗自勾结阿尔哈铁，送枪送炮，许官诺爵，疯狂煽动抵抗，作垂死挣扎。在彝族内部，头人与头人之间、黑舞与白舞之间、主人与主子之间，虽然存在非常复杂的矛盾和阶层歧视，却又一致对外，关键时刻万众一心，爆发出惊人的力量。尤其是阿尔哈铁“神”一般的存在和威力，在那个特定时期可以左右龙岗地区的命运和走向。何况还有游匪的骚扰，以及汉葬之间千百年来形成的民族隔阂；更何况那个奴隶主愿意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拱手交出枪支，“把娃子解放出来，把土地牲畜分给娃子”？所以，“春度龙岗”就远比“智取威虎山”更加困难，意义也更为重大。“春度龙岗”涉及的是民族翻身和制度变革，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是艰苦卓绝的“攻心”战，是人心人性的较量。

这样，小说叙述的难度不仅大幅度增加，而且不得不转换为触及人心、人性的难度。像铁桶一样，“针插不进，水泼不湿，连外面的苍蝇都休想飞进去”，被“国军一次又一次围剿，成师成团的人马马开进去，机枪大炮架起来，表面上烧了些寨子，杀了些娃子，但始终拿他没办法”的龙岗寨，也就相应转换为一座只能被人心人性所“度”、所攻克之堡垒。历史的秘密就隐藏在这里，小说能否成功的秘密也在这里。而挑战这一高难度的小说叙事，正是彝族作家李美桦的优势所在，他就置身在这个民族中，身上流淌着他们的血液，不仅能够与他们的喜怒哀乐共情，会心于他们符号内外的表意，而且作为文学创作者，还能在自己的生命体验中，反思关于这个民族的每一个主语和谓词后面的深意。

由此，穿越既往的语词幻象，返回彝族头人复杂的内心世界，重塑民主改革时期民族人中心人性的现实，是《春度龙岗》在艺术上最为成功之处。这里的人心人性不是西方启蒙意义上的观念之物，而是一个朴素的常识：人的心理和人的本性。《春度龙岗》写出了人心人性的辩证法及其幽微之处。彝族头人，哪怕是阿尔哈铁这样的大头人，并非生来十恶不赦、恶贯满盈，他的人心人性也是由其社会身份建构的。他有奴隶专制、剥削、残忍、反动、罪恶的一面，但作为那个民族的“雄鹰”“领头人”，也有顾及芸芸众生的向善之心。小说写到，当尔布“按老祖宗的规矩”，非人道地惩罚几个娃子的时候，阿尔哈铁骑着枣红马飞奔而至，以“浑厚有力”“滚滚春雷”一般的声音禁止了这一恶行，理由是不能为了几个娃子“伤了这么多老人的心”。最后，到要不要下山的关键时刻，阿尔哈铁想到的也不是个人的生命安危和前途命运。他的对力劝他不要下山的当家娃子阿力次吉说：“是的，我要保自己的脑袋不假。但是，和全寨子老老小小的脑袋相比，我阿尔哈铁这颗脑袋算什么？”他还说：“我都这把年纪了，我怕啥？只要咱们龙岗寨平安安，《春度龙岗》”

《春度龙岗》是一部现实题材力作，它精妙地把握了环境的变动和各方力量的消长对人心人性变化所起到的巨大作用。更准确地说，它把对人心人性的刻画交给了人物所在的“社会关系的总和”，交给了人物的思想矛盾和现实行动，交给了故事的情节和细节。《春度龙岗》网织了当时可能存在的各种政治力量，集合了各种社会矛盾，在成功再现当时复杂的社会形态和斗争形势的情形

《草木志》(书摘)

□老藤

用下地出工，起来那么早也没事做。”曹大姐靠近我耳边说：“人老病多，村老事多，你可要有点思想准备，这村子不让人省心呢。”

我心里咯噔一下，抬头看了老毕一眼，老毕粗犷的模样让人产生一种信任感。我反感男人过于精致，精致的男人溜光水滑，靠不住。老毕说：“农村嘛，哪能没有事，农村工作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协调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地的关系、人与庄稼的关系，至于其他，顺其自然就行。”他停顿了一下指着远处道：“你看到村东面那块大草甸子了吧，只要不动锄不动锄，那里的草会长得跟谷子一样好，要是胡乱折腾，草甸子就成了烂糊头。”

“那个草甸子是不是都柿滩？”我脱口问道。“都柿滩在江边古驿路上。”老毕说，“古驿路原本通向塔溪，后来都被都柿滩隔断了断头路。”

“塔溪是什么地方？”我对这个地名十分陌生。老毕说：“塔溪过去也是驿站，后来变成林场，林场转型后发展成特色小镇，是全省小城镇建设的示范镇，在发展上扣了沿江一圈还不止。”

我上学时知道“扣圈”这个概念，就是领先的运动员在圆形跑道上超越其他运动员一圈以上。对被扣圈的运动员来说这是莫大的耻辱。老毕能这样说，足见塔溪的发展有多么快、多么好。

曹大姐接着她刚才的话说：“墟里村支书叫齐满囤，外号‘打碗花’，自上任始就没过好日子，原本是两个职务一身兼，没想到村委会换届落选了村主任，便心灰意冷不想再干，几次向镇里提出辞职，镇里也研究了，强扭的瓜不甜，正物色村支书呢，这当口你来了，你一来，镇里上下都松了一口气呢。”

“他怎么叫打碗花？”“我也不知道，反正墟里村民都这么叫他。”曹大姐笑着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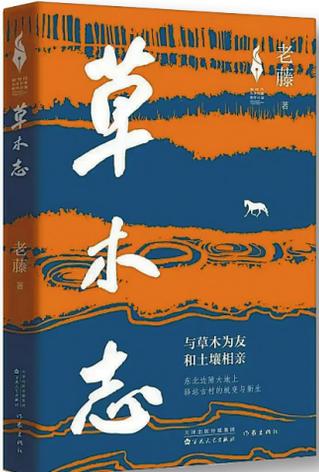
“我会努力的。”我嘴上这么说，心里却开始打鼓，我一个年纪轻轻的外来者能比土生土长的齐满囤强多少？

车开到村委会，村委会的铁艺大门被一条铁链子锁着。从齐满囤的红砖围墙望进去，可以看到村委会一排八成新的红砖瓦房，因为是办公用，房子比其他民宅要高大一些，房脊上有四只不同朝向的大广播喇叭。院门口有个硬覆盖小广场，广场周边有村务公开栏，广场东边有三棵枝叶稠密的老柞树，看上去有点像福祿寿三星。

老毕打了电话，不一会儿，齐满囤一路小跑赶过来，一边道歉一边打开铁锁，把我们让到屋里。齐满囤是个像受气包一样的中年汉子，背有些驼，额头和眼角的皱纹已经固化。老毕说：“满囤，把那三个人叫来开个会吧，我要宣布县里、镇里的决定。”让我感到奇怪的是，镇里的决定宣布完，齐满囤骆驼的背忽然变直了，他笑着说：“谢谢，谢谢，我终于可以睡个囫圄觉了。”



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



《草木志》，老藤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24年2月

去资料室查阅资料，发现墟里村颇有些来头。该村前身是始建于1682年的驿站，旧时称北站，史书上有相关的记载。初始，北站有站丁三十人、站官一员，每个站丁拥地五垧、窝棚三楹，这个数字在驿站中属于富裕的。后来站丁眷属新增，清末裁驿归邮，驿站全部改为民籍，北站正式更名墟里，墟里人被称为“站上人”。

沿江镇副镇长老毕和镇组织委员曹大姐陪我去墟里村报到。

老毕是个年逾五十的“地板干部”，在副镇长职位上已经干了6年，用他的话说就是蜡头已经不高了。因为做过多年民政助理，老毕对全镇13个自然村的情况了如指掌。40岁出头的曹大姐是个热心肠，脸色黑红，不施粉黛，与别的女性总是喜欢挎个坤包不同，曹大姐下村，空着两手啥都不带，显得格外洒脱。后来我才知道，空着手下乡对自己是种很好的保护。

墟里村到镇上的距离大约15公里，因为多半是山路，皮卡车开不快。路上，老毕指着沿途的山峦和溪流一一进行介绍。什么牛乐屯、奇克特、罕达气，听起来怪怪的，搞不懂具体含义，一问，才知道这些地名都是鄂伦春语、鄂温克语的音译。相比之下我觉得墟里名字还不错，至少听起来有文化，让人想到陶渊明那首家喻户晓的古诗。沿途皆是森林，树木密实，有天然林也有次生林，树种以落叶松、柞树和白桦居多，间或还有椴树和杨树。植被如此，一看就不缺水。老毕说这些树都是大路货，最好的树是红松，墟里小凉山有大片红松原始森林，出产优质松子。

小兴安岭的山大都是连绵的丘陵，少有险峻的山势，路上基本不见峭壁悬崖，皮卡车好像在绿色浪谷里穿行一般，车子开上一座山冈，眼前豁然开朗起来：前面是一个长长的缓坡，白色的混凝土路蜿蜒着通向下面一座炊烟袅袅的村庄。老毕让司机停车，说要下车给我介绍一下。老毕说这里叫望江台，是墟里最佳观景处，近可鸟瞰墟里全貌，远能眺望平缓的中俄界河黑龙江。老毕指着坡下的村庄说：“瞧吧，这就是墟里，全村308户，户籍人口933口，村民中方、石两姓占七成，其他三成是齐、邵、金三姓。墟里人多才艺，喜欢吹拉弹唱的

彷徨中的沉默与自由的奔跑

——读宇澄长篇小说《三十三岁的决心》

□乌兰其木格

2022年，一首名为《我来人间一趟》的歌曲，唱出了现实与理想间的悖论：“一路上跌跌撞撞受过不少伤/再回首半生已过恍如梦一场/我望着天空愈发地迷茫/不知道未来究竟在何方/一辈子匆匆忙忙虚度时光/所谓的诗与远方还只是奢望/我随着人潮四处飘荡/心中的话却不知和谁讲/我来人间一趟本想光芒万丈/谁知世人模样只为碎银几两。”这首歌唱出了人生的无奈，在直击人心的同时，带来无尽的人生感悟。

宇澄的长篇小说《三十三岁的决心》，开篇即揭示出“90后”京漂女孩王慧敏为“碎银几两”陷于繁杂工作的日常。在三八妇女节这天，她不仅没有得到早下班的小小福利，反而成为“背锅侠”，既要消除不当营销引发的舆情，又被取消了奖金。尽管无喜和委屈，但她却不敢表达反对意见。多年职场生活早已让她炼成钢，她放弃了幻想，“成熟理性”地衡量自我：“干不成什么大事，更不奢望成为什么大人物。拿着税后刚过万的月薪，只干自己分内的事，不抢活儿也不推活儿，既不对外项目的热搜热度血压上升，也不对扑街的寥寥互动数据紧张。每个月最踏实的瞬间就是工资入账的通知短信……勤恳谨慎地打一份工，就已经用尽了毕生力气。”在生存的需求下，王慧敏将自我嵌入资本发展的链条中，在无可避免的同质化和秩序化过程中，属灵的自由和主情的浪漫感为可望不可即的奢侈幻想。比如她少年时曾痴迷乒乓球，然而父亲认为这项运动无用，在他的阻止下，王慧敏只能放弃爱好。凭借心无旁骛的刻苦，她得到了研究生学历，并在梦想中的大都市北京谋得一份工作。然而，京城米贵，居之不易。工作多年的她，依然是无房、无车、无伴侣、无理想、无人际关系的“五无”青年。站在33岁的人生节点上，王慧敏在“生存以上、生活以下”的疲于奔命中，散发出老气横秋暮气。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王慧敏害怕被资本市场淘汰出局，在巨大的恐惧和不安中，战战兢兢而又谨小慎微地活着。作者通过对王慧敏现实生活和精神困境的揭示，诚实客观地描述出一代人倦怠的生活态度与方式。这种态度与方式的形成，并不能简单归结为她们的情性禀赋，而是更多来自社会的规训，其中暗含着对社会结构性压迫的怨念和反抗。

雷蒙·威廉斯认为，“情感结构”具有时代性，是人们对自己所处的生存环境、时代氛围、社会风

俗等做出的反应和由此形成的共同感知与相似经验。王慧敏并非个例，可谓我们时代职场打工人的典型代表。与职场中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明哲保身相较，她在亲情、友情和爱情中也保持着疏离谨慎的态度。王慧敏的女儿愚昧自私，满脑子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对女儿唯有指责和冷漠，在王慧敏中考那年，他与母亲离婚并重新组建家庭，将全部的爱投入儿子身上；王慧敏的母亲虽然关爱女儿，但却以自己的理念认知和掌控着女儿的生活，她将婚姻破碎的原因归结为女儿的性别，以怨妇心态吐槽前夫的种种行径。母亲并未真正理解女儿，更不认可女儿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以自认为正确的说教干预女儿的人生。原生家庭的破碎与父爱的缺失，造成了持久而难以愈合的精神创伤，王慧敏的隐忍、清冷和小心翼翼，无声地确证着缺乏环境中长大的孩子所具有的人格特质。作者借由小说这一另类的探测器，指出了中国式家庭中的父母在情感与教育方面的偏狭和局限。百年前，鲁迅曾满怀忧虑地提出“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命题，百年后，鲁迅所批判的父权制和陈腐思想依然顽强地存在。严格说来，我们的很多父母是不合格的，甚至成为子女成长道路上的异己力量——最初的伤害和最深的创痛均来源于父母，致使后辈的人生充满磨难，再也无力肯定一种信赖、朗健和积极的人生。

值得注意的是，在王慧敏的成长道路上，她敏锐地感受到了家庭和社会对女性的性别压迫，女性作为“第二性”，始终处于被压制、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地位。男权文化依然如幽灵般盘踞在人们的头脑中，即使是现代的知识女性，也无法挣脱“幽灵”的罗网。宇澄以细腻而冷峻的语言述说了王慧敏、刘亚男、程林雪子、汪梅、陈子薇等女性被男权文化挤压或异化的事实。为保住工作，王慧敏曾长时间忍受部门主管张畅的性骚扰；职场女强人刘亚男虽然工作能力出众，却因女性身份，在职位晋升中败北，无奈之下跳槽到别处；刘亚男的妈妈践行“男宝至上”的理念，虽然儿子对她厌烦和不理睬，却并不影响她对儿子的喜爱和珍重；陈子薇致力于金钱的争夺和占有，她以美貌为筹码，试图嫁入资本新贵之家，但她的男友喜新厌旧，另寻新欢，无情抛弃了不再年轻的陈子薇。无疑，陈子薇是一个精致的利己者，也是一个擅长“雌竞”的蒙昧者，更是一个可悲可叹的受害者。



《三十三岁的决心》，宇澄著，作家出版社，2023年12月

《三十三岁的决心》以细节化和谱系化的女性受难史，揭示出当下社会性别不平等的现实。从家庭到职场，从乡村到都市，从现实到精神，女性时时处处遭受着差别化的对待，更糟糕的是，部分女性因长期浸溺在这种环境中，反而习以为常，甚或成为其代理人。小说中的沈董是一位热爱乒乓球的优雅女性，她对同样喜欢乒乓球的王慧敏表现出和蔼可亲的态度。但当王慧敏勇敢揭发张畅对女性的骚扰时，沈董的态度是默然和敷衍的，甚至不无警示意味地提醒王慧敏，要以公司大局为重。公司形象与金钱资本才是沈董关注的重心，与之相较，普通员工遭受的凌辱和伤害，只是微乎其微的小事。作者以女性的身份认知和生活体验，探究现代社会精神文明的滞后，而这一切如此集中而惊人的方式呈现出来时，我们才会发现“司空见惯”背后的种种悖谬与不公。

但是，在停滞不动的坚硬现实下，冲决与改变的力量也在蓄积。宇澄通过程林雪子、艾瑞克这些坦荡、率真、拒绝被同质化和冷漠化的“00后”青年群体，证明了现状可以改变的希望。正是有感于年轻一代的勇毅和正直，王慧敏开始敞开心扉，将自我纳入到这个青年群体中，并将之作为心灵休憩的归属之地。在这个小小的共同体中，她们手挽手、肩并肩，循着自由和诚实的道路前行。哪怕前路漫漫，哪怕失业抑郁，依然骄傲地拒绝规训和异化。小说结尾，王慧敏与一条拉布拉多犬奔跑在雪中的北京，作为机械化工生产中的一只小小甲虫，她终于“破土而出”，喻示着个体的觉醒与新生。“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小说在对青年的信任和对未来的瞻望中，寻回了属于人的诗性正义。

(作者系温州大学人文学院瓯江特聘教授)